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历史考察

吴超

摘要: 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离不开文化和文明的支撑指引。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探索出符合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明古国迈向现代文化强国,中华文明焕发新生,以自信包容开放姿态推动世界文明发展。

关键词: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文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G122;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706(2025)02-0084-09
DOI:10.19861/j.cnki.tqsjyl.20250507.003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历史的血脉,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文明的指引。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缔造了绵延五千余年的文明体系,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着不竭养分。面对深重的民族存续危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历经革命淬炼、建设探索与改革实践,成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实现了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一、觉醒新生: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开启

近代西方列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世界格局变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840年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严重危机,国家将倾,民族将亡,古老灿烂的文明黯然蒙尘,到了难以赓续的地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抗争,无论是求助传统以重振中国文化,还是效仿西方以再造中华文明,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飞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迅速显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难免存在脱离国情的情况,导致大革命失败等挫折。毛泽东总结指出,当时党在统一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史研究”(21ADJ01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治理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2020mgczd002)。

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缺乏经验,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尚不成熟^[1]。在革命低潮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决意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突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教条化运用马列主义的倾向,强调需“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2]。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理论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命题。毛泽东着重阐释了理论本土化原则,明确指出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通过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及传统文化结合,中国共产党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方向。

(二) 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之路

面对君主专制崩溃后的制度真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即致力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形态。党的一大提出“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党的二大明确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施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1931至1934年中央苏区三次民主选举选民参与率超过80%^[4],奠定人民政权建设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探索实施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通过《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建设“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中华民族新国家的构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5],并对“新国家”的制度架构作了阐述。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一制度创新既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又适应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成为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核心成果。

(三) 工业化道路的探索肇始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工业化视为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把中国稳步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构想。陈独秀在1920年即强调发展工业的紧迫性,“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6]。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在于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工业”^[7],1934年苏维埃政府明确“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8]。抗战期间,确立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奋斗目标,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业化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并明确提出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9]1945年党的七大制定工业化战略蓝图,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逐步建立重轻工业体系。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建设“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明确“农业国转工业国”的历史任务。这些战略规划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开创了后发国家工业化新路径。

(四) 新文化建设的现代转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冲击使中华文明面临三重危机:器物、制度及精神层面的全面落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即肩负文化重建使命,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颁布《教育行政纲要》《文化和建设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活动。至1934年,中央苏区的2932个乡建立列宁小学3052所、补习夜校6462所、1656个俱乐部,覆盖29万余人^[10],进行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推动文化、教育、文艺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抗战时期,毛泽东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强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涌现《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经典作品,重塑民族文化精神。1949年9月,毛泽东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1]。通过制度性文化改革(“三三制”政权)、大众化教育实践(苏区扫盲)及民族化文艺创造(延安文艺),中国共产党成功构建起反帝反封建的

新文化体系，为现代文明转型奠定思想基础。

二、革故鼎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奠基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启了现代文明重构的历史征程。在“站起来”的历史转折中，中国人民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通过制度改革、经济重构和文化重塑三大维度，迅速革除旧社会的积弊，完成了文明形态的现代转型。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实现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为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政治和制度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其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基本施政纲领，在正式宪法颁布前承担临时宪法职能。该纲领明确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人民主体地位。

随着经济建设开始，加强国家制度建设成为迫切任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以根本法形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形成“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确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这部社会主义性质宪法所确立的三大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制度间的有机衔接与功能互补，共同构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基本架构。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创造性解决了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难题，截至1958年共建立4个省级自治区，保障了各民族平等权利。在中国建立的新型政治制度，是历史变革的结果，是人民掌握命运的必然选择，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国家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关键，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新

中国成立后，开启了现代化的新阶段，从单一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战略转变。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同年，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创造性地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既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又系统性地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全面改造，开创性地构建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积聚有限资源用于大规模工业建设。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2]。中国共产党正式将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为“四个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中国共产党以苏联经验为镜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新中国建设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了重工业优先、工农业并举的自主型工业化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将“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保持工农业正确比例，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3]。尽管面临困难，全国人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始终坚定。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两步走”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目标。这种战略调整既反映决策层对国家发展规律的认知深化，也体现立足国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在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匮乏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通过系统性制度建构，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

（三）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文化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建设也迎来高潮。新民主主义文化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

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目标、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和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发展路径，文化建设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接管、改造与利用旧文化，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保证了文化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革新旧中国教育文化，系统性重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体系。各高等学校附设先修班和补习班，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师范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均由国家供给，使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均享有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广大农村多措并举，采取办冬学、识字班、学习小组和业余学校等各种形式，为农民接受教育创造条件。1952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群众性扫盲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发展困境。1951年至1953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扩大招生，为工业化建设输送专业人才。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发展方略。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这一历史性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和制度支撑。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确立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创造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造为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等优秀影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学精品，《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

了中国科学院，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这是一个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英雄模范，形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民族财富。这些精神标识的塑造，不仅支撑了物质建设，更构建起新的价值体系，使集体主义、奉献精神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这场东方大国的文明重构，通过本土化实践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证明后发国家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政治领域实现传统王朝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经济领域完成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文化领域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型价值体系，开创了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这种探索既为当代中国发展奠定了根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三、改革出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国历史进程中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也随之迈入崭新阶段。这一时期，成功开创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同时，持续拓展和丰富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内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使中国以坚定的步伐紧跟时代潮流。

（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邓小平理论，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中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新世纪。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重大理论课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时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实践探索的根本性制度成果，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路径，更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理论等重大创新，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突破性发展，显著提升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整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小康社会的内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用“小康”来诠释现代化^[14]。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部署。小康社会是既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形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经过长期努力，到2000年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首次构建起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框架。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并根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际，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调整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

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基本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建立起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党和国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纲领性文件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指导原则和核心任务，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与规划。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政治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彰显出蓬勃生机与制度优越性。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15]。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正式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体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质要求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优化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治理效能，更能通过民主法治建设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潜能，从而构建起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机制，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提供制度保障。

21世纪前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中明确

提出更高标准的发展目标,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党的十七大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在原有“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正式将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框架,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实践的深入,从党的十二大确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重建设目标,到党的十五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协同发展战略纲领,直至党的十七大形成“四位一体”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逻辑。

(四) 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逐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公共文化服务置于优先地位,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1979年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80年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文艺创作迎来新高潮。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理论命题,并将其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构成要素,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高度确立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21世纪伊始,我国迈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持续加剧,呈现多元文化思潮碰撞交融的复杂格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增长态势。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各领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实现系统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普惠性、均等化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文化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文化创作生产迈入持续繁荣阶段。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影视作品年产量跃居世界首位,数字出版业规模突破万亿,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基本形成,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取得重大进展。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行免费开放,文化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偏远的村落。

四、拓展创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也进入新历史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系统性创新突破,创造性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持续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谱写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的时代华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性战略支撑。

(一)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时代特征与历史方位,系统整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语境下的范式突破。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深刻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更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至全新高度,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其核心内容概括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概括其核心内容为“十个明确”,并总结了“十三个方面成就”。党的二十大提出“六个必须坚持”,阐述了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由“十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和“六个必须坚持”共同构建成完整的科学体系。该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自洽性，其内涵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学科领域，不仅完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精髓，更基于新时代实践需求提出了原创性理论观点。这一思想体系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进程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理论生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实践中不断获得确证与拓展。

（二）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和根本利益。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者旨在通过系统性建设，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者规划通过接续奋斗，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继展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系统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正式确立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创新发展国家治理范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党中央相继召开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专题研究，擘画了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在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确定了“两步走”发展战略，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综合实力

位居世界前列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部署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超出了预期，具备了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基础和巨大潜力。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相继就宪法修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议题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层面实现了制度创新的重大突破。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7]。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更凸显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的制度优越性。从“一五”计划至“十四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构成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制度创新驱动的发展进程，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便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构建了全球最为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一历程不仅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飞速发展奇迹，还实现了社会的长期稳定，更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三）开创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范式，构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18]。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战略规划，旨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位一体”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文化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五个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统筹推进、全面建设、协调发展。其中物质文明是根本，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条件，生态文明是基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相呼应，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衔接。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0]中国式现代化使古老的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持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传承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坚决避免片面化倾向，力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过度物质化的固有弊端，从而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进入新时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展开，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进行深入阐发，提出“中国方案”，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实践路径。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1]，把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and 国际合作平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者相互呼应、相辅相成，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为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核心价值导向，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该倡议从理念到理论、从愿景到倡议，已多次纳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会议的成果文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30%，超过美国、欧洲、日本贡献率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22]。中国将自身文明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成功开辟了一条以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为核心的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颠覆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深刻改变着世界文明格局和话语格局，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追求。

结语

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致力于强国复兴的百年奋斗，同时也是对文明转型的深入探索。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古老的中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功开辟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铸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踏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坦

途。中华文明以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显著特性，奠定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现，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既遵循了普遍的文明发展规律，又展现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并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从传统文明古国迈向现代文化强国，中华文明焕发出蓬勃生机，以自信、包容、开放的姿态，积极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3]中华文明从历史的深处走来，还将继续迈向新的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创造人类文明奇迹的中华儿女，将更加坚定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谱写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辉煌新篇。

参考文献：

-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0，534.
-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47.
- [4]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51.
-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6.
- [6] 陈独秀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2.
- [7]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
- [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489.
- [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73.
- [10]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329.
- [11] 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 [12][13]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439.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 [15]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0.
- [1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
- [1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7.
- [1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N]. 人民日报，2021-07-02.
- [20][2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
- [2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95.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32.

作者：吴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毛军吉